



## 看灯

□ 王俊坤

中国传统文化活动里就有看灯。元宵节是看灯的高潮。古时候看灯的热闹和诗文暂且不说,只说近年里高邮的看灯。

我是高邮城的土著,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印象里,往昔的高邮城虽然年年上灯看灯,但都属于民间的自发文化现象,偶有好看的彩灯,不成气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印象最深刻的是高邮城区中山路上老高邮镇政府前的一些花灯和灯谜,尚可一看。其他地方,乏善可陈。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邮撤县建市,市政府号召各单位组织灯会,展示传统文化,庆祝撤县建市。那是高邮灯会的一次高潮。各单位纷纷行动,正月十三上灯的时候,高邮城区异彩夺目。当时的高邮城,看灯主要是三条线。一条线,高邮市的传统主街,中山路一线,从城北北门大街至中街口,一路皆是花灯。有传统的兔、猴等十二生肖彩灯,还有老人民剧场、电影院前的荷花灯、龙船灯等,比较精彩的是老高邮镇政府前的走马灯,变换出各种景象,引发人们阵阵笑声。第二条线是府前街,当时也是热闹之地,这里是

市委市府所在地,沿途有公检法等大单位,还有人社局、造纸厂、高邮中学等,这里的花灯也是值得一看的。第三条线是通湖路,这里有农机三厂、粮食局、工业局、人民商场等,这些单位都有一定的实力,还有其他一些单位的花灯也在这里展示。这些花灯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派人在现场值守,敲锣打鼓,声势浩大。

我那时在一个单位担任中层干部,领导将本单位彩灯展示的任务交代给我,必须在北海电影院广场展示有特色的花灯。我苦思冥想,难办!一是时间紧,二是经费所限,单位不可能出大资金操办。没办法,只有一个字——借!我先去扬州大学借彩灯未成,后利用亲戚关系,从扬州玩具厂借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彩灯,用大卡车运到高邮北海电影院广场。配以彩灯装饰,神形兼具,独一无二,观者如潮,引发不少赞叹。

那时,人们不仅在高邮看灯,还到外地看灯。有一年,四川自贡花灯在南京莫愁湖公园展览,单位组织员工前去观展。自贡花灯,诚是一绝,既有花灯细节的传神出彩,更有气势宏伟

的灯阵,令人叹为观止。由于观者太多,走失了同去观灯的一个小孩,大家焦急万分,延误了返邮的时间。

最难忘的是1984年鼠年春节看灯。正月十三上灯那天,我们早早就吃了元宵,忙着去看灯了。我和怀孕的妻子从北门大街上了中山路,一路观灯品赏,心情极佳,街上的人们也是兴高采烈。大约晚上八时,中山路上老电影院广场已是水泄不通,人流密集。妻子此时已怀孕数月,担心人多拥挤,不太安全。妻说,我们还是回家吧,人太多了。我那时年轻气盛,自以为强壮无比,就说,有我护着你,保管没事。于是我们又随人流南行,行至老高邮镇政府门前处,只见人潮汹涌,拥挤异常。我身边有一四十多岁的汉子带一小孩,被人挤得东倒西斜,小孩吓得大哭,汉子大呼,不要挤了我的小孩,不要挤了我的小孩。我和妻子也被挤得随波逐流。那时,人潮似乎已经失控。有人爬到了路边的树上,有人爬到了屋上。情况十分危急,我用尽力气维护妻子的安全。好不容易挤到一棵树下,我用身体挡着人潮,拼尽了全部力量。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人群逐渐松动,后来慢慢散去。现场被挤掉的鞋子有好几十双。

看灯是一项轻松、有意义的传统文化活动,让我受益无穷。如果有灯会,我还会抢先去看。

## 劬劳的丈母娘

□ 陈其昌

我从未想到过,我的丈母娘在1942年金秋季节结婚的时候,没有花轿,没有送亲的人员,也没有办喜酒,结婚的用床是老葵花杆子拼凑的。这在农村里有过,界首镇上从未听说过。我很难想象,我的岳父及丈母娘是以一种什么心情进入洞房。这些事,丈母娘从未对我说过,还是爱人讲的。

丈母娘雍立英出生在一个小业主的家庭,有房无地,家里开个磨坊。小日子本还可以,可是,其哥丢下妻子及子女,全家人尽管还靠磨坊为生,但是日子越来越难。嫂子连子女都带不过来,哪里会照顾正在上小学的小姑子呢。有时嫂子也拿她出气。不得已,辍学。10多岁的少年,便到股实人家做女红,缝衣、绣花,什么都干,只图一个饱肚子。我的岳父,也是从小失去双亲,靠外婆抚养成人,上到简师毕业。他俩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大概是同病相怜,才有那种简单的婚嫁。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岳父到界首六安做教师。战乱期间,工资并不固定,有时还拿不到工资。丈母娘便为附近单位(如卫生所)的职工洗衣服,贴补家用。我的爱人当时才四五岁,也帮助丈母娘送过洗干净的衣服。解放初期,岳父仍在农村执教,丈母娘携子女回到界首镇,继续她的女

红活计,生活依然拮据。有一年春节,亲戚送给她家半个咸猪头,才带来些年味。丈母娘生次女小蓉,尚在月子中,一日,将我爱人召至床前:“我心里别人,你快到股大妈妈家称半斤京果粉,以后还钱。”丈母娘吃过开水冲的京果粉,说:“心里稍微好过一点。”那时,有谁按乡俗,送草炉烧饼和老母鸡哩!

后来缝纫机合作社成立,丈母娘成为其中一员。这种合作社多劳多得,她靠心巧、勤劳,踩出来一片新天地。为了多出货,她常带夜班。为了分担我们多女的负担,她将我学龄前的二姑娘小鱼带至界首过了一年。我女儿回忆那段生活,写道:“外婆整天忙,顾不上吃什么,有时我随小姨到小学陪读,晚上陪外婆缝衣。夜晚回家,有时风中飘雪。外婆的大手抓住我的小手,我感到不冷。”丈母娘十分重视子女学生,为了调皮的儿子,多次跑七八里路到界首农中找老师商谈,要求对其子严加管教。我成了她的女婿后,她为我做过华达呢驼绒大衣、狗皮背心,考虑到我的资料、信件、文章多,特地缝制了一个可随意开合的长方形袋子,正面还有个插袋,用心良苦。

丈母娘一生处处与人为善。2002年农历正月十一,她因脑溢血溘然去世,享年83岁。

## 维儒叔

□ 王三宝

所说,他要还原一个“鲜活真实的汪曾祺”。去年12月20日,维儒叔在“汪迷讲坛”主讲《话说汪曾祺笔下故事中的故事》。那一天,我急急忙忙赶到汪曾祺纪念馆,距开讲只有两三分钟时间。只见报告厅座无虚席,门口及边角都站满了人。因来得迟,我站着听他讲了100分钟。我觉得站了值得,他的脱稿演讲太精彩了。

为了能形象立体地反映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以及汪曾祺儿子上“五小”和高邮中学的行走路线,维儒叔几易其稿,用手绘方式制作了《高邮人民路解放前工商业分布示意图》和《汪曾祺旧时足迹示意图》,较为客观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状况,以及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汪曾祺的“人”与“文”提供了新的依据。当今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已作古,第二代也寥寥无几,要了解这类遗存信息实属不易。维儒叔对汪老笔下人物的解读与钩沉,信息量很大,有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维儒叔曾先后陪同著名

独立制片人季丹、著名作家苏北、《北京青年报》青昧团及《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宋诗婷等,到《受戒》里的庵赵庄寻访。庵赵庄距高邮城约二十里,确是一个僻静之地,战乱时汪曾祺一家来此避难,在这里住了半年之久。现在的庵赵庄仍在,庵子经几次修理,格局未有多大改变。他对《徙》《异秉》《鉴赏家》《大淦记事》《卖眼镜的宝应人》《金大力》等汪曾祺笔下人物的后代进行走访探寻,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探访文章同他出版的新著《琐忆汪老》一起,还原了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和“旧时足迹”。2019年7月13日和2020年8月3日,《北京青年报》副刊分别以《我追寻你走过四十年光阴》《还原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和旧时足迹》为题整版进行了报道,《报刊文摘》和《作家文摘》还作了转载。

因为维儒叔与汪曾祺是街坊邻居,对汪老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情感,他写的和汪老有关的文章更有广度、深度,更具真实性和可读性。可以说,《琐忆汪老》一书与他近期写的系列探访文章,把史料性、趣味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还原了一个鲜活的汪曾祺,对全面研究汪老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我的爷爷

□ 谈健

镇,金国金兀术……”心中还是会涌起一份自豪的。

后来求学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深受其影响。如果没有爷爷打小带我去茶馆,那么中国古典文学于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爷爷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板正。老一辈的人总是比较封建的。爷爷每年最在乎的事情有二,一是清明、七月半和过年上坟烧纸;二是每年腊月的祭祖,我们那儿俗称“做羹饭”。上坟烧纸爷爷很讲究,首先折元宝的纸就有两种,一种是黄表纸,一种是锡箔纸,分别是金色和银色。爷爷从来不买现成的元宝,每一次都是买纸回来自己裁、自己折。爷爷说:“烧给老祖宗的钱,要用心。”我自小就会折各种各样的元宝,爷爷教的。爷爷上坟烧纸,都会把我带上。他每袋元宝烧给哪位先人都分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袋一定是烧给没有后代的游魂,现在想来才明白爷爷心思之细、之善。

爷爷是2016年夏天走的,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整整四年了。

爷爷留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帮我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我刚牙牙学语的时候,爷爷就每天带着我去茶馆里听书。所谓的听书就是在茶馆里听书人讲故事,说书人说的书种类很多,五花八门,但是大多是演义小说。我印象最深的有《说岳全传》和《杨家将》。那时候小,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很愿意去,因为能过嘴瘾、解馋虫,爷爷会给买五毛钱的冰棍、一块钱的豆腐脑等零食。

茶馆是老年人的聚集地,同样也是孩子们的聚集地,老年人听书,听不懂的孩子们扎堆玩游戏,弹弹珠、劈元宝、炸卡片等各种我们那代人独有的童年游戏,乐在其中。随着年岁渐长,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吧,我渐渐喜欢上了听书。也许是从小的熏陶,也许说书人的讲解过于精彩,那一个个慷慨悲歌的英雄,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让我如痴如醉。听多了、见多了,自然而然也就见得多了,小学时期我就是个讲故事能手,模仿着说书人给班级小朋友讲。现在想来,一个小屁孩能站在讲台上模棱有样地对着一群小屁孩讲道:“话说岳飞屯兵朱仙

那晚,我陪朋友打完台球,从吾悦广场出来,天空刮起了刀子风,行人稀少的路上空旷清冷。我打了一个寒噤,缩着脖子,掖好衣襟,疾步回家。

走到广场西南侧,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头戴三角巾,佝偻着身体,在四下里张望。我心里嘀咕,老太太是不是迷路了?我放慢脚步,靠近她。见到我,老太太抬头,腼腆地问我:“请问到欧洲城一期朝哪里走?”“你道走反了,越走越远。应该从这儿向北,过红绿灯,从路北走,穿过汽车站,再向前就到了。”我边说边比划。

“这……我来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走的。”她说着摇摇头,叹了口气,眼神中透着疑惑。

我思忖,一定是周遭高楼林立,广场坐落于西南向,方向感差点的确难认呢。欧洲城一期距离此地约1.5公里,距我回家的路,不过多绕1公里,权当锻炼身体吧。我和蔼地说:“我送你回家吧。”老太太连说了两声:“谢谢同志!”

风“呼呼”地刮着,我和老太太在人行道上并排走着,路灯下的她三角巾下露出白发,额头满是皱纹,脸上点点褐色的老人斑。我心生恻隐,说:“你年纪大了,应该让孩子陪伴出行。”“下晚到吾悦广场散散心的,哪晓得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人老不中用了!”她说时,脸庞夹杂些许忧愁和无助。我宽慰她,不要担心,一定将她安全送回家。老太太脸上露出笑容,和我聊了起来。她姓

## 寒夜偶遇

□ 高晓春

徐,今年77岁,儿子在上海打工。她今天上城给儿媳送些老家的青菜、慈姑和大蒜,哪晓得出来散步便找不到家了。我笑着说:“没事,没事。”

穿过红绿灯,向西走约一刻钟,从汽车站路口的斑马线过去,就到欧洲城一期朝哪里走。老太太不消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了,我一阵轻松。谁知,老太太突然沉着脸说:“这里不是我家,唉,走错了!”她双手掩面,无奈地蹲在路边。

我心里一惊,肯定是老太太错报家门了,这怎么办啊!深夜10点多钟了,天寒地冻的。她迷路有一段时间了,这时体力不支,加上焦急,才蹲在路边的。我将她扶到路边的石凳上坐下来,然后问她儿子的电话号码。老太太一脸茫然,摊开手掌说:“我只带了老人机,打小不识字,电话号码不记得。”我接过老人机,迅速找到她儿子的电话号码,让在上海的儿子立即通知家人,尽快联系我。

夜渐渐深了,偶尔传来汽车喇叭声,寒风吹来,时间显得漫长。这时,老太太儿媳打来了电话,说,婆婆出去有3个小时了,她家住在欧洲城二期,她在楼下等我们。

原来老太太将住址记错了。

“好的,最多六七分钟就可以送到家!”我兴奋地换着老太太的手,向前走去……